

挑战、适应与融合: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

——章开沅先生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述论

陈才俊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挑战、适应与融合的过程。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涉足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不仅个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从理论与方法上对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一定的引导与推动作用。章氏将中国基督宗教史置于跨文化对话的宏阔视域,以现代化理念解读宗教传播的神学内核与价值取向,理性还原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根植的艰难进程。

[关键词] 章开沅;基督宗教;中国基督宗教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基督徒

[中图分类号] B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7)02-0095-08

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根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而这段历史可以说至今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20世纪80年代中期,花甲之年的章开沅先生将自己的治学重心从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与商会、近代化道路比较研究等领域转向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潜心耕耘于一个对他而言全新的学术领地,攀越了其学术生涯的又一高峰,堪称学界奇勋。他在该领域的卓越贡献,一直受到国内外学人的广泛赞誉。作为国际著名的史学大家,章开沅先生提倡“走近历史的原生态”,长于在追求“通识”、“圆融”境界的基础上宏观把握社会历史的演绎与流变。一方面,他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可行性与互动性,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古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一样,都拥有共同的终极关怀,其对话理应“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1]25}。另一方面他指出,基督宗教来华推动并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但“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单一模式”^[2];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是用西方的现代化克服中国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优秀的成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传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地参与

其中。此可谓其研究中国基督宗教史的重要学术理念。

一、走近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的原生态

1985年春,早年就读于著名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后久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子健教授访华,建议由章开沅先生领衔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于是,在章先生的率领下,中西学界诸多精英展开了这一任务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历史重寻工作。章先生20世纪40年代曾求学于著名教会大学之一的金陵大学,后长期执教于由教会大学华中大学发展而至的华中师范大学,对教会大学的生活、教育乃至历史作用体会甚深。他认为,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应该抱持实证的态度;同时,该研究还应是交叉性的,既有学科的交叉,又有时空的交叉,因此要加强中外合作与交流。而且他强调:“不是仅仅就教会大学研究教会大学,也不仅仅是在教会史的范围内来研究教会大学,而是从更广泛的文化史角度来研究教会大学,特别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教会大学。”^[3]他身体力行,从理论与方法上对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主导作用。

[收稿日期] 2006-09-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东北亚基督教运动比较研究”(1105JJD770114)

[作者简介] 陈才俊(1964),男,湖北松滋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

1. 创立评价中国教会大学史的“三个区别说”

19世纪末以来西方教会先后在中国创办的一批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西方史学界20世纪50年代已展开对该课题的深入广泛研究。但在国内,由于“左”倾思潮的长期影响,这一历史产物被简单视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文化租界”、“反动堡垒”,因而罕有学者涉足。面对长期以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在西方”的尴尬局面,章开沅先生认为,其症结在于以政治评价取代了学术评价,以较为表层化的民族主义情结代替了对教会大学这一历史事物的理性分析。因此他主张,该研究的突破,首先在于排除历史成见,并用客观、全面、科学的标尺揭示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4]。

通过发掘文献与考察历史,章开沅先生看到,教会高等教育是西方在华教会教育体制的重要环节,同时亦为早期教会初等、中等教育的高层次延续。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主要功能是培养高级布道人员或宗教领袖。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得到飞速发展,学生人数迅猛增长,并且日益本土化、专业化和世俗化,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事实,章先生提出了评价教会大学史的“三个区别说”^{[4]、[1]20}:一是将作为教育机构的教会大学和西方殖民主义本身区别开来;二是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渐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三是将教会大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区别开来。大量事实也表明,在早期,教会大学的确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的“为基督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但后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与其教育功能日渐疏离,教育功能逐步占据中心地位,专业教育、学术水准和社会工作日益提升。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实现了本土化,实际上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

二十来年的实践证明,章先生当时对中国教会大学的理性考量,为后来该研究在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乃至欧美的深入拓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站在跨文化对话的高度审视中国教会大学

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产物与载体,其发展变化亦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鲜活档案。章开沅先生自涉猎该领域之始,即将研究对象置于跨文化对话的宏大层面。他认为,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异质文化的碰撞与融会,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据此,他很早就大胆预示:“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必将对近代

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讨产生促进的作用。”^[4]过去二十来年的学术发展史也充分证明了章先生高瞻远瞩的学术见识。

过往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无论是中国学者抑或外国学者,大多将其视为单向的西学东渐,即西方为传播的一方,东方为接受的一方。然而,章开沅先生却认为,既然称之为交流,便必然有不同程度的双向对流。中国教会大学诚然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但它毕竟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本土化、世俗化。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4]。有关此论,我们从曾任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后易名为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即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主席的芳卫廉(William B. Fenn,亦有人译为芳威廉)的著述中得到了佐证。他说:“在基督教大学中,中国人和西方人有了交往,并非没有摩擦,但通常不会引起战争,而是互惠互利;中国的知识也通过基督教大学的诠释和示范,传到了西方。作为欧洲和北美基督教徒关怀的一种表达,基督教大学成为精神和文化的使者,帮助向东方解释西方,向西方解释东方,尽管有帝国主义联系和外国特征的阻碍。”^{[5] 236[6] 245-246[7]}章先生曾解释:“我之所以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基督教大学史,就是想用比较平和的心态来从事此段曾经众说纷纭的复杂历史。从历史上来看,文化交流一般都是双向的,尽管有主动与被动、强势与弱势、高级与低级的区分,尽管在交流过程中还必然存在着许多冲突与排拒,但总的趋势毕竟是异质文化的适应、改造与本土文化的包容、吸纳,从而逐渐形成两者之间的融通。”^[8]

关于从文化层面来推进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章先生还提出,不能单纯将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或者教会看作是纯西方的、外来的产物。他认为,我们现今常常说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其中理应包括业已在相当程度上本土化了(indigenization)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神学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部分,其中固然有许多陈旧的糟粕,但同时也保存着许多终极关怀的哲理与追求至善的理想。

我们应该加强对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本土宗教和基督宗教的研究,这不仅可以探明近代中国宗教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也有利于更完整、更全面地吸收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3]。

3. 对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现代化解读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教会大学在其创办与发展过程中,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独特的功能。关于这方面,章开沅先生首先对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起到的示范与导向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教会大学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等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现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4]。

其次,章先生认为,教会大学不仅通过自己造就专业人才,而且还通过在校师生的专业实践,直接在若干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随着宗教功能的逐渐减弱与教育功能的日益增强,学校不断彰显出其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与社会学系,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圣约翰大学的商科等等,都以独特的方式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4]。

再次,章先生认为,中国教会大学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洪流的一个支系。世俗化带来了教学水准、学术品质的提高,密切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但并未带来更多的基督化(Christianization)。serve the society 逐渐超越 serve God,甚至由手段提升为目的^[7]。所以,“尽管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工作者的奋斗目标,仍然是用基督教文化影响以渗入中国,直至最后实现中国‘基督化’(或曰:‘中华归主’);但他们推动教会大学迅速走上本土化、世俗化、学术化的道路,毕竟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满足了社会的实际需要,从而或多或少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了贡献。”^{[9] 80}

二、与中外基督徒展开心灵对话

章开沅先生曾提出过著名的“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参与历史,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而“理解的最好方法是与古人对话”^[10]。所以,他比较注重通过与典范的中外基督徒展开心灵对话,去解读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根植。章先生主张,“重视通过个案研究寻求理论解释,常能为我们提供若干新的视野、思路 and 参照系统”^[11]。同时,他又认为群体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倡导社会群体(或称社会集团)

的研究方法^{[12]2-3}。于是,他在有关中外基督徒的研究方法上则较好运用了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相结合的范式。

1. 走近容闳,理解容闳

提及容闳(1828—1912),人们自然会将他与西学东渐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容闳更是一名地道的基督徒。他7岁入读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18岁随传教士留学美国,成为“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13]11}的第一人,深受基督教文化的浸润与濡染。但是,由于相关原始资料与文献阙如,容闳研究很长时间都是中国史学领域的薄弱环节。1988年,章开沅先生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档案部(Yale University Library,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容闳私人文献,为中国的容闳研究开启了新的局面。

过往学者对容闳的认识,多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为背景来解读其现代化思想与现代化实践,而章开沅先生却是以宗教思想与文化遗产为路径,将容闳置身于全球化、国际化的语境与人类文明传播的洪流之中,阐发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其一,章先生认为,容闳是近百余年西学东渐历史大潮的典型产物,是西方文明(包括基督教文明)“中国化”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把西方基督教的使命感与奉献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天下为己任与回报祖国融合起来;又把西方近代化以个性解放为基础的 ambition(雄心),与中国古代经典所提倡的大丈夫气概贯通起来。因此,他留学美国的起因与归宿都是以近代西学改造中国,而不是纯粹归化于西方。”^{[14] 575-576}其二,章先生认为,容闳不仅是西学东渐的先驱者,而且是东学西渐的践行者。章先生通过悉心查阅耶鲁馆藏发现,容闳不仅对《四书》和若干中国史书、诗词有所了解,而且还利用这些典籍中的名言佳句为众多美国级友赠别留言。其后,他在哈特福德(Hartford)担任中国留学生监督工作期间,不仅督促留美幼童学习中文经典,而且向耶鲁大学赠送《纲鉴易知录》、《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山海经》、《康熙字典》、《三国演义》、《李太白诗集》等书。章先生认为,体现在容闳身上,“西方人为东方文化的固有魅力所吸引”,“故国文化的基因必须要在与美国同学、友人长期相处中有所展现”,“这就是容闳致力于东(中)学西渐的缘由”^[15]。

2. 还原“真诚爱国的基督徒”韦卓民

虔诚的华人基督徒韦卓民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宗教家;不单对中

国的文化及宗教传统十分精通,而且对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亦非常了解。1990年,章先生远赴美国集中精力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期间,通过爬梳、研析大量中外文献,对韦氏的思想与实践予以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考察,还原了一个“真诚的爱国的基督徒”的真实形象^[16]。

章先生认为,在思想方面,韦卓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一方面认为“在基督那里,蕴藏着智慧和知识的无限宝藏”,一方面又认为,应该“让基督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生根”(Rooting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Chinese Soil)。站在基督教徒的立场,韦卓民当然期望中国的基督教化,“将远东拥有世界最悠久历史的这个国家的优良文化,带到主的神坛前,作为对主的奉献”。但是,作为一个有爱国的中国人,他又主张基督教应该中国化,即不仅应该产生本土化的教会,而且应该产生本色化的神学。基督教必须尊重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国形式”。在实践方面,韦卓民一直是中国基督教内部爱国与革新潮流的卓越代表。他既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潮流,反对殖民主义利用宗教作为侵略的工具,更反对宗教以不平等条约作为靠山;也赞成反帝反军阀,虽然对反基督教运动难以苟同,但却称之为“诤友”,承认基督教本身确实需要革新。他还赞同收回教育主权,主张“要使教会学校都归中国自办,受中国政府之监督,及其一切实施都依着中国的教育训令及学制而办去”^[16]。抗日战争期间,韦卓民不仅率校西迁,与全国人民共同承受了深重的民族灾难,而且还向海外广泛宣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援。作为大学校长,他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认为“际此生死存亡之秋,中国人民的教育实系我们抵御外侮的文化前线”^[17]⁹³。他曾自豪地宣称:“战争中的中国教育是一部史诗,将为中国人民子子孙孙永志不忘。”^[17]⁷⁸作为基督徒,他亦将自身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向海外介绍说:“在基督徒倡导之下,战后救济、医药服务、儿童福利等工作已经显示出来,教会的爱心和善意是为全人类的,不管种族和国籍……也显示出,传教士在必要时愿意牺牲自己生命,以尽传教士职责;以及中国基督徒爱国,也决不后人,因为他们是基督徒。”^[17]⁷³章先生对韦卓民的认识可以说是十分深刻的。

3. 重新定位“较受基督教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陶行知

章开沅先生一直非常推崇、关注并致力于对伟大教育家、同时也是基督徒的陶行知的研究,并与唐文权撰著出版过《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一书。通过考察传主教育哲学理念形成的历史轨迹,章先生发现,陶行知是中西文化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产物,所以,该书没有就教育言教育,也没有限于就中国教育言中国教育,而是从较广阔的视野,即从文化互动与跨文化的向度,来深刻阐释陶氏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发展过程。章先生在书中既肯定“金陵求学时期基督教的道德教化对他影响不浅”,又溯源求证:“基督教要人去伪心存真心,自我牺牲,爱人如己等有关道德教化,在他身上确实都留有深浅不等的痕记。”^[18]⁸¹⁻⁸²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特定历史时期非学术因素的干扰,章先生当时没有就基督教文化对陶行知的影晌予以深入探析。

十多年之后,针对国内陶行知与基督教文化关系论析依然阙如的局面,章开沅先生指出,主要原因在于较少有学者能系统而深入地钻研此课题,或者是学界根本上就抱持不同的观点。但是章先生也认为,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研究陶行知虽然是一个新的路径,但亦不可将其视为惟一的视域。他明确表示:“像陶行知这样的大教育家、大学问家,对于中西各种文化、精神资源,多半是兼容并包,博采众长,如他服膺王学而不可能称之为儒家,师从杜威而又超越杜威一样,基督教的影响也很难把他局限于基督徒教育家这样狭窄的框架之中,这是他与赵紫宸、韦卓民、陈裕光等教育家的不同之处。”^[19]章先生进而阐明,把陶行知定位于为“较受基督教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或“富有传教精神的教育家”,比较符合实际;没有必要在“基督徒”字眼上钻牛角尖,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思想内容而非形式。

4. 剖析“南京帮”的特殊身份与文化认同

“南京帮”(Nanking Gang)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活跃于南京的一个美国传教士群体的自称。他们大多长期服务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现代化。据章开沅先生考证,“南京帮”一词最早见于1942年11月24日金陵大学农艺学教授林查理(C. H. Riggs)夫人写给已返回美国的米尔士(W. P. Mills)牧师夫人的一封信,信上说:“几天以前,章文新(F. P. Jones)夫人和我邀请‘南京帮’茶叙……”^[20]²³⁴这一特殊群体的诞生,源自于欧战之后北美学生海外布道运动的蓬勃兴起。章先生认为,“南京帮”有两个特有的文化标识。其一,这些被称为“传教士教育家”

(missionary educator)的新一代美国人,有别于早期的许多西方传教士。他们大多在来华前已受过高等以上的良好教育,具有不同的专业特长,属于学者型传教士群体。其二,对这些传教士而言,南京为他们最先提供了稳定而又优裕的职业,甚至为他们提供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环境;而这个城市绵长的历史和旖旎的景色,又深深地吸引了他们,融入他们永恒的记忆,与他们的整个人生相伴相随^{[20] 236 237}。

“南京帮”中有一位杰出的人物叫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 1887—1978),他不仅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现代化及中西文化交流贡献甚巨,而且是章开沅先生大学时代的老师。贝德士1920年来华,在金陵大学执教达30年,被章先生称为“学者型的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当代少数优秀的中国基督教史专家之一”。章先生曾两度远赴耶鲁大学,以近一年的时间伏案查阅全部有关贝德士的档案文献,先后撰写了《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为实证》、《巨大的流产——贝德士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西方人眼中的东亚基督教——以贝德士为个案研究》、《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等文,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1937.11—1938.5》、《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贝德士文献研究》等书。章先生将贝德士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主要归结于三个方面:其一,对金陵大学的历史学科乃至整个文科的学科发展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其二,抗战期间对南京地区难民极尽可能地救济,对日军的暴行予以无情地揭露,为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保留了大量难得的第一手证据;其三,穷晚暮十几年之余力,撰写The Protestants' Endeavors in Chinese Society, 1900—1950)《新教徒奋进在中国社会:1900—1950》)这部计划中的鸿篇巨制。章先生览阅过贝德士未完成著作的写作提纲及大量笔记、备忘录后,觉得这是贝氏为后人撰写中国基督宗教史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首先,“在那些零碎片断的备忘录中,记录了他有关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许多理念”;其次,“他在13年期间勤奋搜集积累的大量资料与索引,可以为我们现今编纂中华基督教史提供许多重要文献的线索”;最后,“编纂中华基督教史乃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以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决非个人所能单独完成”^{[21] 194 195}。

章开沅先生在分析“南京帮”的特殊身份与文

化认同时指出,包括贝德士在内的那些1950年前后回到美国的传教士教育家们,曾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特殊群体。作为美国公民,他们相互间却自称为“我们中国人”(We Chinese)乃至“我们南京人”(We Nankinese),有一个永远难以解脱的“中国情结”。他们背负着“帝国主义分子”的恶名被中国“礼送”或公开驱除出境,而回到故国却又被麦卡锡主义者疑为来自中国的“赤色分子”,但他们始终无怨无悔,把数十年奉献给中国的艰苦生活视为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美好岁月^{[22] 162}。这更让人感受到了“南京帮”及贝德士故事的酸楚与凄美。

三、探求基督宗教及其传播的文化内核

20世纪80年代中期,章开沅先生本想从文化史、教育史和现代化的路径探析中国教会大学史,以弥补中国近现代史学术领域的一个空缺。然而二十年来,其研究视域已拓展至中国基督宗教史及整个宗教问题。他认为,“民族与宗教乃是当今乃至下个世纪困扰世界的两大复杂问题”;“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研究,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文化、艺术、教育、历史、神学等等专门领域,实乃涵盖整个人类相互理解、沟通乃至和谐相处的终极关怀”^[23]。所以,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中,他始终将宗教与人类命运、社会发展紧紧联系起来,将本土化、全球化、普世性、民族性等理念渗透其中。

1. 着墨于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

“本土化”是章开沅先生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中着墨较多的篇章。通过广泛研究中外基督教有识之士的经典著述,结合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章先生精辟阐释了基督宗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艰辛历程与经验教训。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19世纪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教依然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上帝对于东方人而言仍然是一个外来的“主”,“归主”与“征服”则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与民族尊严,而且很容易被理解为西方人的僭妄乃至殖民主义的张扬。进入20世纪20年代,一种新的理念引入传教事业,传教士们试图把“事奉上帝”(serve God)寓于为满足中国社会需要的“服务社会”(serve the society)之中,甚至主张通过新的社会与经济重建运动,形成更好的社会格局以实现基督教文化的精神价值。于是乎,除直接宣教福音与引人归主以外,教育、医疗、农业与社会改革等等也同样具有扩大基督宗教影响的明显效应。尽管如此,章开沅先生还是发现了基督宗教没有妥善解决好其在华传

播的两个深层次的问题:一是所传为何?二是由谁来传?他认为,如果不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则很难完全实现其在中国的“生根”(rooting)与“落户”(settlement)^[23]。他以传教士来华兴教办学为例,认为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教)化中国”,亦即是使中国“基督(教)化”,但结果更为明显的却是自身被“中国化”了^[8]。据此,他提出了一个颇耐人寻味的命题:“为了中华归主,首先要主归中华。换句话说也是一样:为了中国基督化,首先要基督中国化。”^[23]此可谓章先生对基督宗教在中国本土化之睿见。

章先生还认为,外来宗教在中国社会土壤上真正落户必然需要几个世纪的艰苦努力,而既往众多中外基督徒的坚毅奋进也并非没有历史上留下痕迹。他始终相信海斯格芮夫(David J. Hesselgrave)说过的一句话:“宗教运动必须具有本土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意义,也要采用传统的方式。如果这个运动产生于本土文化内部,它自然企望传播、示范这些观念、价值和方式。如果它是从外介绍进来,它必须使之便于本土理解,否则便要费力重新解释才能使之成长。”^{[24] 304, [7]}他以两位美国已故著名中国基督宗教史学者为例,解析了这一观点。他说,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将自己有关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专著定名为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Missions in China* 《基督教在华传教通史》,贝德士把自己未完成的遗著称之为 *The Protestants' Endeavors in Chinese Society* 《新教徒奋进在中国社会》,都不敢自认为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中国基督宗教史》。章先生由此提出了两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其一,“基督教在中国植根与落户仍然是一个有待继续艰苦努力的漫长过程”;其二,“撰写完全意义的中国基督宗教史,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23]。

2. 彰显基督宗教传播的普世性

基督宗教自视为普世性宗教,自认为具有超越人类存在之时间与空间意义,因而也就彰显出全球化的价值取向。在章开沅先生看来,基督宗教本来就不专属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它向全球逐渐传布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移植于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过程;而教会人士世代梦寐以求的非基督教地区的基督化,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基督宗教在这些地区的本土化。他说,“从我们历史学者的眼光来看,基督教的普世性,与其他各种世界大宗教一样,不仅在于其固有的神学内核,而且也

是经过千百年来各种语言和文化的诠释阐发,逐步磨合融通渐进形成的”。同时他还指出,国人对宗教普世性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具体性的东西就是“普世性”;一是认为西方具体性的东西中根本不存在任何“普世性”,或者干脆把“普世性”的东西一概附合成为中国古已有之。而章先生的理解是,其一,普世性应该是超越于区域或国家、民族的具体性之上的,如果认为“只有经过西方诠释的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那仍然未免流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僭妄”。其二,“中国的基督教毕竟是从西方传来的,并非本土所固有;因此中国对于基督教的理解,终究不能背离基督教的原来基本教义”^[25]。

针对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章开沅先生指出,百余年来几代中外有识之士似乎很难取得比较一致的共识。严重的分歧始终存在:许多传教士认为“中国归主必须有中国文明的基督化,也就是西方化”;而也有一部分传教士,特别是中国传教士,始终反对这种简单的甚至带有文化殖民主义的基督化与西方化。历史事实表明:“明清以来,特别是20世纪20和30年代许多中外基督徒的不懈努力,基督教在教会与神学两方面的本土化都已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在历经磨难数十年之后,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城乡各地得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转型期一些迷茫的人们寻求精神家园的需要,弥补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失落感与飘零感……当然它与中国主流文化的整合依然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1] 25}章先生认为:“时至今日,如果仍然把基督教简单地看作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工具,那必然会伤害众多真诚基督徒的感情。同样,如果有任何外在势力出于政治目的,蓄意挑动基督徒与本国政府的对立,那也会把基督教引入危险的歧途。”^{[1] 25}由是观之,只有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教内外人士,客观评估、理性思考与正确对待基督宗教在中国乃至其他非基督化地区的拓展,才能促进这种文明的有效传播与根植。

3. 强调人类精神信仰的共识性

宗教与民族,宗教信仰与民族主义,古往今来都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而又极为棘手的问题。卓新平先生指出:“民族精神乃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其民族优秀成分的集中体现及其民族文化之精华所在。”“宗教在某种意义上亦属于相关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因此,宗教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26] 280}从某种

意义上说,宗教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要素。

章开沅先生一向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倾注于民族的命运与社会的发展。面对当今世界暴露出的诸多不安定因素,他指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仿佛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单纯依靠科技决不能建立合理而完善的社会。现今的人类社会,自然还不能说是缺一轮或缺一翼的社会,但至少可以看作是跛足的或倾斜的社会。如果任其恶性发展,也许有一天人类将会走上自己毁灭自己的道路。他迫切感受到:“时代呼唤人文精神,精神文明急需健康发展,而关键仍在于人类的自我完善,首先则在于人性的复苏。”“现今为了复苏人性和纠正人类文明偏失,就应该具有这种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努力发掘包括基督教与其他优秀宗教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有益的精神资源,营造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文化,共同挽救整个人类的沉沦!”^{[27] 11-12}

现今世界,由于意识形态与精神信仰的多元化乃至多极化,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对宗教与民族问题亦有不同的诠释。对此,章开沅先生强调全人类的精神信仰应该首先建立在一种共识上,那就是,“只要是真正的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都支持,应该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我认为我们共同面临的任务是挽救人类精神文明”。他呼吁全球有识之士,要“不分信仰、不分主义、不分党派、不分国界,携起手来,吸取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来建设新的人类文明,来挽救全人类”^{[28] 30-31}。此乃章先生一贯倡导的“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这一著名论断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中的又一鲜活显现。

四、结语

章开沅先生非常欣赏他的老师贝德士提出的两点主张:一是“寻求一种观察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督教因素的健全视线”;二是“寻求对于基督教国际的与跨文化的关系的真实经验的理解,包括帝国主义的成见与亚洲人及发达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主义的理解”^{[29] 5a [21] 192}。他认为,此两点可作为我们中国人现今撰写中国基督宗教史的追求目标^{[21] 192}。21世纪来临之际,章先生又高瞻远瞩:“今后的世界,必然是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世界全球化绝非意味着人类文化归于一统,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必将各自带着具有个性魅力的文化,参与更为密切而又迅速的相互交流。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相互融合也是必然的。当然,融

合会通应该是平等的和互利的,不同于殖民主义式的征服与强加。因此,在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之际,我们对于各种各样文化尤其应该持有更多的理解与尊重。”^[8]这也正是章开沅先生站在跨文化对话高度,对中国基督宗教史予以现代化解读的思想根基与理论源泉。

[参考文献]

- [1] 章开沅. 世局变迁与宗教发展——以教会大学史研究为视角[M]//章开沅. 传播与根植: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 [2] 章开沅,罗福惠. 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序言[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 [3] 章开沅. 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序言[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 [4] 章开沅,林蔚. 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言[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 [5] William B.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M].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 [6] 芳卫廉.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M]. 刘家峰,译.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
- [7] 章开沅.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为实证[J]. 学术季刊,1996(1): 184-192.
- [8] 章开沅. 序[M]//吴梓明. 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9] 章开沅. 教会大学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M]//章开沅. 传播与根植: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 [10] 章开沅. 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J]. 江汉论坛,2001(1): 5-7.
- [11] 章开沅. 序[M]//马敏.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12] 章开沅,马敏,朱英. 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 [13]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长沙:岳麓书社,1985.
- [14] 章开沅. 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M]//吴文莱.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15] 吴文莱. 容闳与中国近代化[M].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 [16] 章开沅. 序[M]//马敏,周洪宇,方燕. 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 [17] 韦卓民. 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M]//万先法,等译. 韦卓民博士教育文化宗教论文集. 台北:华中大学韦卓民纪念馆,1970.

- [18] 章开沅. 唐文权. 平凡的神圣——陶行知[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1.
- [19] 章开沅. 序[M]// 何荣汉. 陶行知——一位基督教教育家的再发现. 香港: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2004.
- [20] 章开沅. “南京帮”的故事——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M]// 章开沅. 传播与根植: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21] 章开沅. 巨大的流产——贝德士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M]// 章开沅. 传播与根植: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22] 章开沅. 贝德士与金陵大学[M]// 章开沅. 传播与根植: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23] 章开沅. 自序[M]// 章开沅. 传播与根植: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24] DAVID J. HESSELGRAVE ed. Dynamic Religious Movement: Case Studies of Rapidly Growing Religious Movements Around the World[M].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78.
- [25] 章开沅. 序[M]// 刘家峰. 离异与融合: 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26] 卓新平.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宗教信仰在中国[M]// 神圣与世俗之间.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 [27] 章开沅. 文化危机与人性复苏[M]// 章开沅. 传播与根植: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28] 章开沅. 世纪之思[M]// 章开沅. 传播与根植: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29] CYNTHIA MCLEAN ed. Gleaning — From the Manuscripts of M. S. Bates [B]. New York, 1984.

Challenge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On Mr Zhang Kai-yuan'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CHEN Cai-jun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Christianity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challenge,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modern China. Since the mid-1980's, Mr Zhang Kai-yuan, a famous historian, has begun a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He has not only gaine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but also played a leading and promoting role in formulat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the field. Mr Zhang views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s a cross-cultural dialogue, he illustrates the theological essence and values of religious spread in concepts of modernization, and rationally restores the original condition of the difficult process of Christianity's spread and establishment in modern China rationally. This paper offers some discussions and analyses on Mr Zhang Kai-yuan's academic thought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Christian universities, domestic and foreign Christian educators, and the 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Key words: Zhang Kai-yuan; Christianity;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history of China's Christian universities; christian

[责任编辑 梅莉]